



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及其当代价值

——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毛华兵 杨丽珍

恩格斯在总结人类认识史，总结他和马克思40年哲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形成历史深远，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就开始思考灵魂和肉体、灵魂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探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原始形式。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以后，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也得以产生，古代哲学家主要提出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到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表现为神对世界的关系问题，并出现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论争，这两派的论战曲折地反映了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斗争。在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表现为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主要表现为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思维的客观性。针对整个近代哲学，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说，近代哲学停留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框架，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不可能解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早在恩格斯之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经意识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起点是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全部哲学的意义是由这个起点而构成的。费尔巴哈也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看作是哲学史所谈论的最高问题。然而，包括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整个近代哲学，始终停留在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思维的客观性。针对整个近代哲学，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说，近代哲学停留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框架，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不可能解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分析哲学认为，离开人类语言，是不能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理论之前，先要有关于语言的理论，因为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但人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分析哲学的这一见解不无道理。因为“语言是

思想的直接现实”。人类关于世界的认识成果积淀于并表现在语言中，只有从语言的意义出发，才能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然而，分析哲学走偏了，因为它在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马克思预见到这种趋向的出现，他说：“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特殊的特殊的王国。”

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后，进一步对这一问题包含的两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何者是派生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往往称作本体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或阵营。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潮，在科学主义流派当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入本主义流派里边也有很大影响。它把哲学归结为研究“实证的事实”和“实证的知识”的学问，认为一切知识都要以实证的事实为基础，没有被经验所证实的概念、命题，如关于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都应该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实证主义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企图取消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它关于“命题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或者“可确认性”标准，也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同一性作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是根本不同的。唯心主义者把知识、概念、思想看作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唯

心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认识只同感觉、知觉打交道，不超出主体范围，否认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唯心主义者比如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绝对理念的外化、对象化或异化，认识现实世界就是认识现实世界的思想内容即概念，概念的运动、推演就是绝对理念的逐步实现。

在哲学史上，恩格斯第一次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经典性概括，在今天都没有变得陈旧和过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仅存在于恩格斯之前的时代，而且也存在于他以后的时代。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人类活动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历史如何变迁，只要人和世界的关系存在，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着。哲学是在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关系的，首先必须思考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哲学理论的创立，都不可能逃避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因此，只要人类在实践着、在思维着，哲学基本问题就具有现实的意义。

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为我们研究思维发展史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完整展示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及其内在联系，是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即由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转向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一般侧重于本体论方面；到了近代，哲学研究更多侧重于认识论方面。在现代，哲学以反对形而上学的面貌出现。最早，马克思和孔德几乎同时举起“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马克思创立了“真正实证的科学”。在时代性上，马克思和孔德的口号具有一致性。但在指向上，孔德把“拒斥形而上学”局限于经验、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指出了另一条思路，即在“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关注人类世界，即哲学应“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以往全部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关注宇宙本体，注目于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的物质”，却遗忘了对人类世界的关怀。当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人类世界

时，他就同时在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世界的依据，并以此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研

究对象，这个依据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分析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

看，所体现的也是对人与人类世界联结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求。分析哲学主张把语言作为研究哲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但它却以倒退的形式推进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

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为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它又反过来成为人们生活和实践中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恩格斯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通过把握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为开展理论研究和批判各种思潮指明正确的方向。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只有关注现实，并回答存在于人们实践活动中的问题，才能真正发挥其指导作用；实践只有向理论提出任务，并为理论研究提供条件，才能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或者说是思维认识存在、又在存在基础上实现自我跃迁的过程。然而，理论与实践相比较，实践是高于理论的。因为理论源于实践，并要受到实践的检验；理论不能直接实现自己，只有在实践中并且通过实践才能表现和实现自己的现实性。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突出实践的功能，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

重读经典

《先正读书诀》蕴含的读书要诀

□ 王晓兵

《先正读书诀》成书于乾隆年间，此后以钞本流传，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首次刊刻。之后该书又经过了多次修订删减刊刻，流传至今。先贤们的读书之法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具有很高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该书主要蕴含了八个方面的读书要诀。

摒弃杂念 方能专心致志

古人主张学须静也。读书只有静下心来，摒除杂念，排除干扰，才能真正沉潜其中，体会作者的思想，并在作者的意境中，得到自我的升华。《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许衡主张“诵经习史，须是专心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可因他而辍”。黄庭坚则主张“读书先净室焚香，令心意不驰走，则言下理会”。读书要摒弃功利心，秉持一颗纯净的心，平心静气，心无旁骛，做到专心致志，才能真正体会到书中的圣贤意旨所在。

循序渐进 方能积少成多

《论语》曰：“欲速则不达。”《孟子》则曰：“其进锐者，其退速。”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车破马乏，伤足而返，无法到达。读书亦同理。朱熹主张“须是且看一书，一

日只看一两段，俟其通透浚洽，然后可渐次而进也”。如果一件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二件，第二件又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三件，这样下去，则终身不长进。“大抵读书惟虚心专意，循次渐进，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啜而尽其味也。”宋代邵雍认为“学必量力，量力故能久”。可见，善读者需从容涵泳，工夫日进，而精神不疲，积久自然触处贯通，切勿一时贪多务得。

时常温习 方能牢固不忘

遗忘是人的天性，如何克服遗忘？孔子说得极平常，但都是自己有的得之言，其中一个“温故”，一个是“时习”，不温不习，便无处得说与知新。朱熹认为读书“只要量力，不要贪多，仍需反复熟读，时时温习，是要法耳”。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曾主张：“《周礼》《礼记》，俱宜令其温习，一季得一周，庶能记得。侄孙幼时温书，皆一月一周也，《左传》诸书，迄今犹能成诵，皆当时温习之功。”南宋王虚中在《训蒙法》中云：“读书当时虽极熟，久而不读亦必忘。其温习之法：若初读过书一卷，则一日温此一卷；其后读过二卷，则二日温一遍；三卷则三日温一遍，二百卷则二百日能温一遍，亦永不忘。如此既省工，又永永不忘之妙法也。”可见，时常温习，才是克服遗忘的法宝。

用心思索 方能得其要旨

历代先贤们都强调思考对读书的重要性。读书若不思考，则只是相当于识得外表一个皮壳子，未真正识得里面的精髓。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将告之。”又曰：“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所谓神物，非真从天降地出，乃是自家精神灵爽之所为。清代理学家名臣李光地则认为“记诵所以为思索，思索所以为体认，体认所以为涵养也”。陆桴亭主张，“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可思。学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古来圣贤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穷理’二字”。杨应之学士言：“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读书需要沉潜其中，细读多思，只有精心思考研究，细细咀嚼玩味，才能体会到文章的微言精义，吸取其精华。

吟咏诵读 方能见其义理

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李光地言：“读书千遍，其意自见。某初读《参同契》，了无入处，用此法试之，熟后遂见得其中自有条理。”陆桴亭《思辨录》中云：“《五经》《四书》《太极》《西铭》之义，必不可不成诵；不成诵，则义理不出也。”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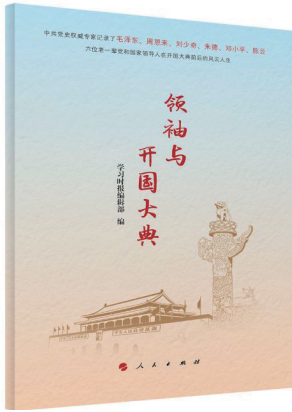
的看法是“要读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尤其古代诗文，须反复诵读玩味，方能有所受益。若只是草草看过一部诗书，不但不得滋味，也记不得，无济于事。因此诵读不仅要疾徐有致，还要眼到口到耳到心到，全身心投入，从诵读中体会节奏感，品味作品的韵味和神韵。

提要钩玄 方能入脑入心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作笔记对记忆和理解所读之书非常重要。唐代韩愈《进学解》中教育弟子读书要“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记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要诀却在“记事”“纂言”两句。凡书目口过，总不如手过。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篇，不如抄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精；“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记所疑，才能真正地入脑入心，久而不忘。

精读一书 方能博览群书

李光地有“精熟一部书”之法，即“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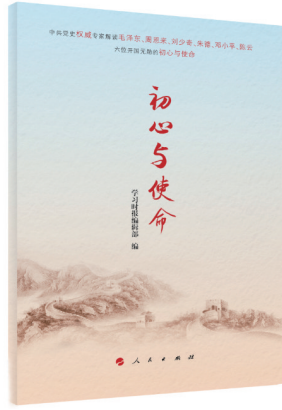
《领袖与开国大典》 《初心与使命》 热销

□ 吴青

《初心与使命》《领袖与开国大典》两本图书上市后都受到读者好评，累计发行量近15万册。

《初心与使命》是一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书，由党史研究专家学者从开国元勋们的光辉革命历程中采掘出人生精粹，凝练成短小精致的6篇文章。文章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带领我们回望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初心，践行为国为民奋斗使命的激昂岁月，也让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读《初心与使命》一书就是一次追本溯源的旅程，党和国家领导人砥砺初心、践行使命的生命华章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底色，照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目标，更加激励今天每一个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砥砺前行。本书自今年3月份出版以来，现已经累计发行近14万册。

《领袖与开国大典》书中收录了《学习时报》公开发表的6篇系列文章，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开国大典前后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夙夜在公、呕心沥血的光辉事迹。文章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的中共党史权威专家。他们长期从事革命领袖思想生平研究工作，在文中精选史料，生动详实地串联起领袖笃信信仰、投身革命



的关键人生节点和重要历史环节，彰显了革命前辈至大至公的革命情怀。本书自今年10月份出版以来，持续热销。



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可用。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没要紧的书，便没用”。黄庭坚主张“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有余力乃能纵横”。先尽心读一两书，其余则如破竹数节，皆会迎刃而解。而尽心所读的这两部书，则必须是经过精心挑选，选取该领域的经典代表之作，而不是随便取一部书便读。如党员干部要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来读，读深读透，那么再读该类其他研究著作才可能一通百通。

持之以恒 方能有所成就

读书贵在有恒，这可以说是读书要诀中之要诀。《荀子·劝学篇》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不舍，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明代吕坤云：“不怕炊不熟，只愁断了火。火不断时，炼金煮砂，可使为水作泥。”读书忽间断而无所成，一时贪多而不坚持，也终将无所成就。读书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废。只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才能不断汲取典籍中的历史养料和思想精华，从而得到智慧启发和正气滋养。



《先正读书诀》是清代周永年辑录我国古代先贤读书治学之法编纂而成的一部著作。周永年（1730—1791），济南历城人，青年时即笃学立品，嗜好读书和藏书，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馆，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乾隆四十年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周永年广览经史百家，学问极其渊博。他编纂的《先正读书诀》所引用的书目包括《周易》《论语》《孟子》《大学》《管子》《老子》《朱子》《思辨录》《训蒙法》《童蒙训》《塾训规约》《问学录》《榕村语录》等共计52种，收录327条读书之法，荟萃了孔子、老子、荀子、管子、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张载、苏轼、黄庭坚、朱熹、陆九渊、王应麟、程端礼、黄宗羲、顾炎武、陆陇其、李光地等先贤们的读书方法，“盖本孔孟之绪论上求之经典，复博采唐宋以来诸儒之说”。周永年的用意，正如王大准序中所述：“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穷则著为文章，达则政行济济。”